

《人间信》是麦家写给千万读者的一封信

富阳区麦家文学研究会举行《人间信》读书研讨会

通讯员 骆炳浩/文 史勤 孙东兰/摄

落黄随风起，人间又晚秋。日前，由富阳区麦家文学研究会主办的《人间信》读书研讨会在银湖街道小河湾农场举行。“麦家理想谷”运营总监周佳骏受邀作“麦家与故乡”专题讲座，简要回顾了麦家的创作经历与文学成就，重点介绍了《人间信》出版后的读者留言及口碑。

会员们在交流研讨后讨论下一步工作计划，表示将积极研究挖掘麦家文学作品的内涵，主动做好麦家文学的阅读推广，为弘扬麦家文学精神、擦亮富阳城市名片作出贡献。



周佳骏作“麦家与故乡”专题讲座



《人间信》读书研讨会合影

《人间信》是写给故乡的一封信

长篇小说《人间信》是麦家“故乡三部曲”的第二部。在富阳区麦家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“人生就是解密的过程”麦家文学对谈会上，麦家深情地说道：“我是喝富春江的水、大源溪的水长大的。我的写作，我的小说，就是这片土地开出的花、长出的草、长出的树，跟这方山水紧紧相连。”研讨环节，会员们阐述了自己对于《人间信》的解读和理解，挖掘人性深处的心灵秘史，引领大家更好地读懂作品的思想深度与文学价值。

在会员高志伟看来，《人间信》是麦家的心灵罗曼史，“他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邃的人性洞察，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家庭、一个时代几十年的风风雨雨、沧桑裂变，《人间信》也因此在文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。”

高志伟认为，麦家的语言很“毒”、

很“独”、很“笃”，自创的“富阳宁词汇”，挤满了读者的眼睛，彰显出国情怀的无限魅力。《人间信》在叙事方式上也具有创新之处——小说以主人公“我”的经历为引，讲述了“我”家四代人、半个世纪爱与恨的循环往复。这种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，使得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主人公的内心世界，增强了故事的代入感和感染力。同时，小说中还巧妙地运用了人称的变化，如从“我”到“他”的转变，寓意着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的身份与心态的变化，这种变化不仅推动了故事的发展，也深化了小说的主题。

“这本书，把我从纷扰的生活中拽出来，让我回归到沉浸阅读的一种状态。我感谢这本书。”会员李玉莲说，小说所营造的环境，讲述的故事，让她有共鸣，“书中写的双边村发生的一切，仿佛就是我从小看到的。有阿根大炮一家的存在，也有阿山道士一家的存在，也有像我们一家的存在。我曾见过村里强悍的一家为了田地争水，背着锄

头、扁担，冲到田头大打出手。因为共鸣，所以我了解这些人物在面对欺压、面对困境的时候，他们是如何生活、如何抵抗的。”

《人间信》是写给人间的一封信

会员何蔼说，《人间信》是一本以“我”为中心的小说。覆盖着蒋富春的“成长之被”，被面是父亲，被里是奶奶和母亲。父亲的自我中心、享乐至上和不负责任使这床被面污浊、毫无体面，而奶奶和母亲无条件的爱与牺牲使被里细软温暖，成为游子长久的怀念。她认为，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（其间有第三人称的转换）是一种不可靠叙述。在儿子和乡人的叙述立场中，父亲是一个被彻底否定的人物，而他却没有申辩的机会的。父亲对美有敏锐的感觉，对弱小（落水儿童）有着救助的本能，他渴望确实受人尊敬的人设，但为

什么他的人生如此窝囊？或许剥离不可靠叙述，可以还原一种不为人理解的人生。

“小说里几乎都是坏人，看来麦家要把恶写尽。”会员王建潮提出，“还是有例外。这就像在一幅灰暗的画面上，麦家涂抹了几道亮色。至少有三个细节给我印象深刻：一个是母亲只一眼就看上了父亲，并致死维护着这个‘潦坏’；第二个，阿根大炮的老大死了，来了个洋气的女人，女人带走了小叔子，这突兀的描写在小说里就像炫目的光芒，让我心生温暖；第三个，妹妹在火车站找哥哥。”

会员余银川说：“《人间信》的作者像医生，把社会的肿瘤切片，恶性良性的化验交给读者；作者像屠夫，宰杀了一头巨大的奇怪动物，肉条放在案板上，皮厚皮薄，肉肥肉精，读者自取，如何烹饪，读者各显神通。《人间信》把整个社会浓缩于故乡千年古村双家村，作者把故乡的故事解剖成碎片，裸露在读

者面前，提示人们，人性中某些东西根深蒂固无法改变，给活在当下的民众一个警示。”

会员陈羽茜认为，如果说麦家之前的作品在题材和人物上自带传奇性，那么，《人间信》不仅延续了传奇化的写作风格，而且拓展了“传奇”一词的指涉空间，他将题材层面、情节层面的传奇转为对人性伦理层面的深度探究，生发出对世俗生活中人物命运、家族兴衰、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叩问。这也是为什么虽然这本书写的不是谍战，我们却能从文字间听到低沉却力量惊人的风雷之声。

她说，《人间信》不仅是人间的一封信，也是麦家老师写给我们千千万万读者的一封信。他用他的写作告诉我们，人间有信，有温暖，有爱，它让我们即使历经苦难仍然初心不改，让我们在被辜负、被盘剥的人生旅途中生长出野草般郁郁葱葱的蓬勃生命力，让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面对布满荆棘也长满鲜花的人生。

【地名志】

夜宿寺坞岭 一屋分属富阳和萧山

“两县三乡六农会”趣事

□倪秋根

大概是1978、1979年间的一天，时任大源财税所所长的郑来根和时任渔山公社、里山公社税务专管员的寿加序邀约我到富阳、萧山两县交界的寺坞岭去走一趟。我因为长期出门在外，1977年4月底才从宁夏石嘴山市调回浙江富阳县工作，一切都感到陌生和新奇，所以欣然前往。

那天，我们从渔山石马头启程，沿着山路向上攀登。刚开始，山路还比较平坦宽阔，走着走着，道路不仅崎岖不平，而且越来越狭窄。有的路段，简直就在柴丛中，不仔细辨认，很容易迷路。就这样，三个人气喘吁吁地爬到了岭头上。村庄坐落在岭头的低凹开阔处。老寿，因为是分管这里的税务专管员，人头很熟。在他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时任大队会计的傅尧存家。

傅家很客气，不仅招待我们用餐，晚上还住在他家。有趣的事情出来了。我们三个大男人，共睡一张大床，共盖一条大被。床很大，长三四米，宽也三四米。被子呢，跟床一样大，是一条蓝底白花的粗布印花被，里面足足装有十斤棉花。我们三个大男人就睡在这一张大床上，共盖一条大被子。因为床大被也大，谁也碰不着谁，相安无事，还暖暖和和的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天刚蒙蒙亮，听到广播声响，是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新闻和气象预报。起床后，我习惯性地想把被子折叠好，竟不知该怎么折叠，横竖都一样长短，干脆平摊着不折了。

下得楼来，洗漱完毕，用过早餐，走到大路上，见一奇观。只见一队小学生向东走，一队小学生向西走，分别下山去了。小学生出门后，社员们也出发了，也是一队向东、一队向西，不同的是，向东的有的骑自行车，向西的都没有自行车。

郑所长原是萧山人，老寿原是绍兴人，他们两个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富阳参加工作的，是我的老前辈了。他们见我看得新奇，对我说出原委。这个大队，横跨富阳、萧山两县，分属于富阳县渔山公社和萧山县义桥公社。岭上有三个自然村，前大庵、后大庵两个自然村属于富阳县渔山公社，寺坞岭自然村属于萧山县义桥公社。这三个自然村又归总为一个大队，富阳叫林峰大队，萧山叫寺坞岭大队。因为小学生读书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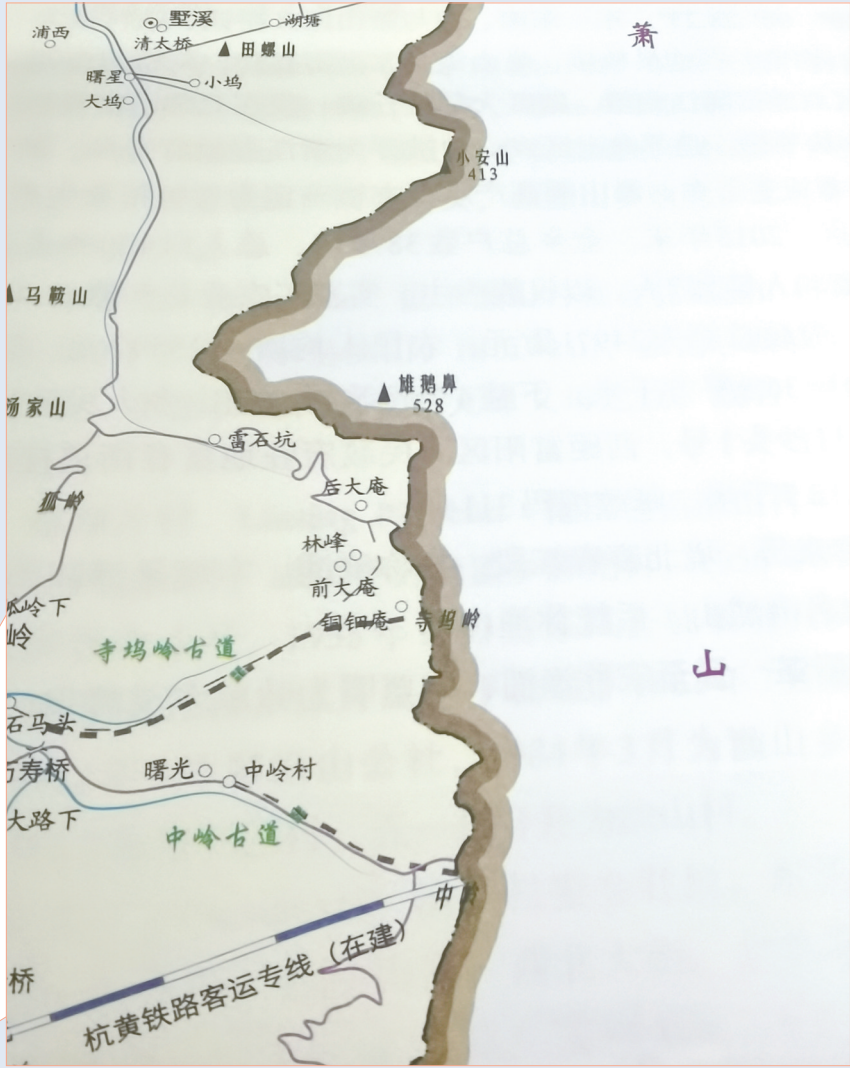
按照户籍来的，两县也都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、兴修水利，都要派义务工，所以萧山籍的小学生和前去做义务工的社员向下山去，富阳的则向西下山去。

不一会儿，向东向西四支队伍先后消失于我们的视野之外。无论是东边还是西边，远远望去，尽是蓝蓝的天、白白的云。

傅尧臣是大队会计。在傅家，税务专管员寿加序开始行使其职责——开税票收税。农业税和工商所得税属于直接税，按隶属关系由富阳、萧山两县分别征收，而工商税和农林特产农业税等产品税属于间接税，富阳、萧山的税务专管员，谁先上山去征收就归谁所属

的那个县。也就是说，萧山的专管员先上去征了归萧山县，富阳的专管员先上去征了归富阳县。老寿和傅尧臣会计很快就办好征税、纳税手续。于是，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。

我打量了一下傅家的大房子，随口说：“傅会计，您家的房子好大呀！”傅随口答道：“不是我独家的。这边一半是我家的，属于萧山县。那边一半是我堂兄弟家的，属于富阳县”。有意思，不仅两堂弟兄分属两县，一座房屋也分属两县。傅会计说，这事情要追溯到解放初的“两县三乡六农会”。1949年5月，富阳、萧山两县先后解放。1950年至1953年，富阳、萧山两县农村全面建立



农会。住在这里的人，都是解放以前从山下搬上山来的。有的来自萧山县，有的来自富阳县，上山后，又都各自与山下的乡村有密切联系。因为各家有各家的亲戚朋友，而这些亲戚朋友分布于两县若干个乡村。正因为如此，岭上各户分别参加了山下的村农会。“这就是‘两县三乡六农会’的来历”，傅会计接着说：“‘两县三乡六农会’是富阳县渔溪乡的二村农会、五岭乡的六村农会、

七村农会和萧山县许贤乡的石门农会、南坞农会、北坞农会，互助合作、人民公社化后，又分属于两县各社、队……”

听了傅会计说大书似的一番话，我们意犹未尽，但时间不等人，赶紧与傅会计告别，循原路下山至石马头，骑自行车分头回大源、富阳。时至今日，夜宿寺坞岭的情景和“两县三乡六农会”的趣闻久久不忘。

名词解释

两县三乡六农会

1950年至1953年，富阳、萧山两县农村全面建立农会，此地农户分属“两县三乡六农会”（即富阳县渔溪乡的二村农会，五岭乡的六村农会、七村农会和萧山县许贤乡的石门农会、南坞农会、北坞农会）。此后，两县农村全面实行互助合作、人民公社化，1984年撤公社设乡镇，村民分属两县情况依旧。富阳县称其为林峰村（社、队），萧山县称其为寺坞岭村（社、队）。20世纪末21世纪初，富阳市、萧山区均推出优惠政策，鼓励村民下山脱贫，部分农户陆续下山落户。然而随着盘山公路修通、山上旅游资源开发和群众性登山活动兴起，有的下山农户又回到山上。在270余人中，属富阳区的约200人，属萧山区的约70余人。

——来源：《杭州市富阳区地名志》